

19 08



惠东文史



516300

惠东县政协文史组编



惠东文史

第一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惠东县委员会文史组

编

一九八七年六月

祝賀惠東文史第一輯與讀者見面

用史知古
教育後人

羅晉琛 一九八七年六月廿二日

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副书记罗晋琛同志题词

推进文化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

叶月坚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中共惠东县委书记叶月坚同志题词

办好惠东文史
为文化建设服务

徐建中

11.7.6.27.

中共惠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建中同志题词

惠东人民
迎奥运

徐汉中

惠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汉中同志题词

抓落实事办得好又快！

许蔚南

惠东县政协主席许蔚南同志题词

惠东文史（第一辑）

在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颖超	(1)
序言	许蔚南	(11)
沿革·文物		
惠东县建制沿革史略		(13)
惠东文物简介（一）		(15)
英烈传略		
华侨楷模民族先锋罗仲霍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周兆吉	(18)
罗仲霍烈士遗墨		(22)
邹鲁《罗仲霍烈士传略》书影		(23)
林森为罗仲霍烈士遗诗题词		(24)
蒋光鼐题罗仲霍烈士		(25)
陈铭枢题罗仲霍烈士		(26)
陈树人为罗仲霍烈士遗诗题词		(27)
戴戟题罗仲霍烈士		(28)
罗仲霍烈士遗诗选		(29)
陈经烈士牺牲的经过	陈明	(34)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记李清薇烈士	陈平·李岳·马林木	(36)

历史事件

- 热汤之战 邵捷声·林万里 (41)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平山三次农民起义 苏 克 (44)
忆惠阳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平山青龙潭乡师) 游 扬 (52)
-

人物志

- 我的父亲黄伯焜 黄云初 (56)
山田良政
——为中国革命多祝牺牲的一个外国人 (61)
浩荡海天 为国为民
——辛亥革命先辈林海山先生传略 林裕球 (63)

史料撷珍

- 惠东盐业的起源及其发展说略 李伟佳 (67)
罗仲霍离乡出洋年份考 周兆吉 (72)
平海古城与“军声” 平海文化站 (74)
-

名胜古迹

- 大亚湾上的一颗明珠——巽寮 赖汉衍·陈立人 (77)
西来古刹话沧桑 戴胜奇 (86)
龙岩探幽 曹静·郭修青 (90)
-

- 征稿启事 文史组 (94)
-

在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邓颖超

同志们、朋友们：

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没有能够参加各小组的会，现在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杨成武同志说他是小学生，我觉得我还是个新的学生。同志们知道我过去做过统战工作，现在还在做统战工作，还参加统战活动，但是，对于统战机关内部的许多工作，包括文史资料工作和其他方面很多工作，我没有直接参加，所以我说我是新学生。在这方面，我还得向大家学习。如果说要说些什么意见的话，那也是我选看了一些会议参考文件和简报，从那里头考虑了一点不成熟的个人的意见。我今天的讲话，没有经过主席会议的讨论，不能代表集体，只能作为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我想，我们政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我们政协机构的性质，包括参加政协的单位，包括政协的几个委员会和十几个工作组，要进行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做决定。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今天我们不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会议是

文史资料工作的专业性会议，我仅就这个专门问题来讲一点意见。我觉得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就是属于这一类。它跟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它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所以，从形式上，从工作内容上看，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属于静的工作，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甚至连政协各个组的工作都可以包括到它里头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是一动一静，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因此，我们说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静的工作又可以转变为活动性的工作呢？我们不去讲征集的时候要活动，就以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说吧，文史资料工作是能够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你们会上发的材料和第九号简报都说明了这方面的好经验。在《广东试向港澳和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这个材料中举到两个例子：一是罗翼群、一是郭典三，我们文史资料登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后代、亲属看到后，很受感动，声言：只要祖国需要一定回来，并且表示今后要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做贡献，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使另外一些人缩小了同我们的距离，有的甚至考虑回国定居。这不是把静的工作又变为动的工作了吗？所以，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不仅要重视它，而且要象刚才杨成武副主席说的那样来进行。他的发言，我都拥护。我只补充一点，我们文史资料工作是要埋头伏案在那儿编辑，然后付印出版，看起来好象是单纯的文字工作，其实

不然，因为我们的资料拿出去以后马上就会起到活的作用。这个文字工作就跟我们统一战线的其他活动性工作一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和影响。再说一点，就是今后要注意提高文史资料的质量。要广征精选，对收到的一些材料，不要因不符合我们的观点，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目标，不符合我们原来的原则就轻视它。只有实行广征精选，文史资料出版的质量才能提高，它的作用也才能随之而扩大。

二、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看，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是非常必要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我在政协常委会上提出的建议，常委会上没人反对，后来在主席会议上又作了研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根据常委会和主席会议的决定进行准备工作的。在这里我声明，个人的意见，变成了集体的意见，就不再是个人的意见了。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在这里提一下，我们对于哪个人说的话，只能说是他讲了什么话，要少用什么“指示”。因为个人的意见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全面的，甚至是不成熟的；而且个人往往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我这次建议，也仅仅是提出问题，不算什么指示。而解决问题是靠今天在座的从各地来的有着文史资料工作的实践和经验的同志们，靠在会议领导小组领导下，大家共同讨论。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得到收获，达到预期的目的。关于这点，我要特别讲一讲，因为过去常常把个人意见当作指示，是指示，就好象是非执行不可。现在，我们要强调民主集中制，不要突出个人，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在一些很具体很小的问题上，受着这种或那种不合宜的、旧习惯的约束，比如凡是负责同志的话都叫指示，似乎习以为常了。我看这种方式，这个习惯，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今天，我们应当改一改。

召开这次文史工作会议，同志们都讲是必要的。而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在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召开以后，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应该跟上两个大会所提出的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第三次文史工作会议是一九八〇年开的，至今已三年了，经过这段实践，我们也需要总结工作，回顾过去，发扬成绩，找出弱点和不足的地方，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以适应今天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通过开会的形式，从事共同工作的同志大家在一起总结。这种方式是必要的。这种总结的会议有大有小，有各种类别，有专题性会议，有综合性会议。我们呢，是总结文史资料工作。总结工作是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今后得到改进提高，更有利于完成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无论什么工作，在一定时期内都应该总结，不能不作检查，任其自流。我觉得有时候在有些情况下是总结不够的。比如拿我们的国家计划来讲，（我讲的是过去罗），对每年的年度计划，缺少总结检查，所以我们执行计划的情况，在第一季度不怎的，第二季度好象进行得还好，三季度再一检查，离计划距离还很大呢，于是到第四季度就拼命地赶，趁着完成任务，结果呢，偏重于数量的完成，质量怎样就难说了。我为什么说这点意见呢？我是希望同志们今后重视总结工作和检查工作。一个季度、一个年度，甚至对某一类或某个专题资料发表以后，根据得到的反映，做一次总结，做一次检查，这样，就可以及时改进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总结工作，不是工作的终止，而是工作的新开端，是为了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着重讲讲总结工作的重要性。这次会议，你们的简报中已经肯定是有收获

的，解决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了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我个人与你们有同感。会议的一个收获就是以后我们在编辑文史资料的时候，审查征集来的稿子的时候，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就是要看我们征集出版的资料对于爱国主义，对于我们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后代是不是有利？有了明确的目标，在选择资料方面就容易统一思想，分歧也可以解决。不过，我们光明确目标还不行，还要确认求实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你们的简报中说，要做到实事求是是不太容易的，是这样。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就要有所根据吧。实事求是的材料，使人看到有所收益，能使他认识一个问题，了解一个问题，增加他的知识，这就提高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最近我看到报上登的民国史的资料，有一篇写“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文章不长，在座同志可能看了。“四大家族”就是蒋、宋、孔、陈。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座大山中的第三座——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我们一定要把它推翻。但是到底这“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怎么发展起来的，它又是如何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讲的非常好，都是讲事实，没有什么议论，没有什么水分，我推荐给同志们们都看一看。我们的文史资料恐怕也应该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加以注意，我们编这类材料时，不能够加于评论。只能以原稿为基础，对来稿进行核对，资料不足的，再想法补充，但不能加上编者的评论、议论；否则，就改变了文史资料本来的性质。实事求是，就是要合乎历史，合乎客观存在。客观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对一件事、一个问题全面地去看、去研究，不能有所偏废，只重这面，不

重那面。说这个人好，就光说他好，不能说他坏，这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呢？拿一件事情来说，光说这件事情收获多大，成绩多大，怎么样胜利了，但是不能说它当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说这件事情的不足之处，这样做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片面性。同志们说实事求是不容易做到，问题就是在这里。但是，有没有办法做好呢？有。这次你们也肯定了，杨成武同志讲话也讲到了，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人、看事。对一个人，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切不可只看到他突出的一点，就加以评价。对于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要用历史的观点而不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来写东西、审查东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材料、编写材料，那我们材料的质量当然就会提高，有科学性，有说服力，使人感受到益处，受到启发和影响。

三、我看有这么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到的各方面的材料怎么处理？是来多少登多少，来什么登什么，还是应当定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征集、处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资料要有分工，有协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要是征集出版近现代史资料，属于党史和党的军事史材料如果送来了，可根据分工协作的精神，将一些稿子交给有关单位去处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发表还是内部发表，也应有个区别。有些比较长的、有份量的资料，可以作为专题出单行本。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

总的看，开这个会是有利于我们改进和提高工作的，能使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发挥它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在这里我再提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那么，写卖国贼、反动派的材料我们还要不要征集？要不要出版？

我请同志们研究，首先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研究。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教育人民，光有正面的材料还不够，还需要有反面的材料。我们光说某某卖国了，我们要爱国，某某是反革命，我们要革命，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事实材料拿出来。比如袁世凯，是怎么卖国的？西太后垂帘听政，可以不可以写？我觉得可以写。写哪些呢？写她卖国啊，投降啊，对帝国主义屈膝啊。这样人民才会懂得，我们要爱什么样的国家，国家要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权。请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党常说光有正面的经验，没有反面的经验还不够、还不足呢？反面教材可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反，为什么要爱。我觉得我们文史资料可以收集编辑一些反面的材料、敌人的材料。

我看到有个简报写到登了康有为、章太炎、张伯苓的材料，这些材料我没有看，不能提意见。但是写个人的材料，写现代、近代著名人物的传略也好，写他的历史也好，我们都要注意全面地来写，力求避免片面性。我们搞近代史料、现代史料，这非常好，可以由近及远。现在我们许多青年，包括中年，对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都不甚清楚，不甚了解。《人民日报》有个专栏，叫做“学点民国史”，我觉得民国以来的历史确实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写的，应该让我们活着的老年人和中青年人都知道一下。如“四大家族”的材料我看了，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去我光知道“四大家族”他们是官僚资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我们要打倒它。但是，它是怎样发家的我不知道，看了以后才知道他们要尽各种手段，把国家财富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搜刮到他们四家手里，对其他的他们还有控制权，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要打倒啊！我再给你们讲个非常简单，也值

得引起我们极大深思的事情，就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作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件事情他的侄儿侄女都不知道。“文革”中人家提出来了，他们来问我，这下对我们敲了警钟，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缺少历史的教育，一方面固然事情忙，另方面好象还用不着告诉他们，哪晓得告诉晚了，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跨党分子，毫不奇怪，但那些年轻的红卫兵就不理解，共产党还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有些秘密共产党员被安排在国民党机关，后来国民党实行独裁，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于主张抗日、主张团结、主张进步的分子，稍微看出苗头的就要抓人。这些人的确不是他们的人，是我们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左派，是我们派到国民党的机关去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是为了抗战救国，不是什么挖国民党的墙脚。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这些同志不能再在国民党统治区呆下去了，我们只好赶紧把这些人疏散撤退。解放以后，这些人到了我们一些机关工作，在我们妇联的较多，结果在“文革”中这些人就挨整得厉害，甚至于说，妇联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我们党领导下的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竟说成这样！过去在国民党机关是隐藏有秘密共产党员的，“文革”中，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也不跟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所以就搞错了一些人。最大的案子是新疆的案子，你们听说了。盛世才拘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也包括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叛徒”。实际呢，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周恩来同志跟张治中这个老朋友交涉，要他把这部分人释放。当时张治中在新疆，是蒋介石派他去解决新疆问题的。他办了这件事，把这些人都放了，都送回延安了，建国以后，这些同志撒在各个部门。